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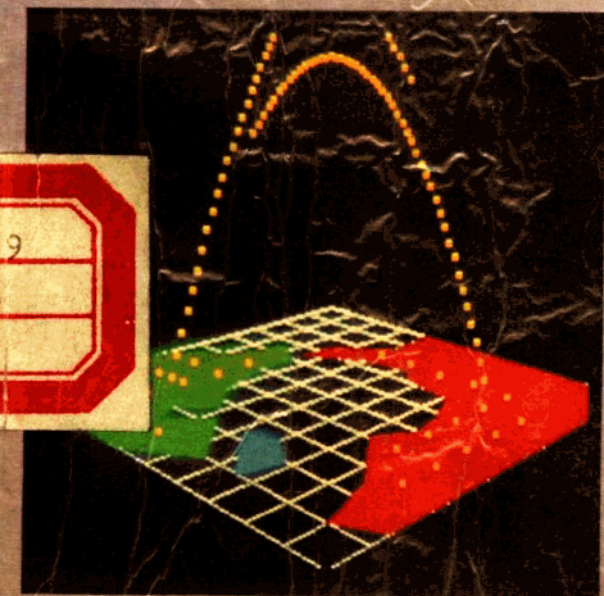
主月年 · 心理 · 人生丛书

# 青年 与社会变迁

〔美〕理查德·弗拉克斯 著

陆建华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 译者序

关于七八十年代美国青年“趋向保守”、“对政治冷漠”、“崇尚以事业为上的雅皮士文化”之类的议论越来越盛行的同时，60年代席卷全美的学生运动依然是许多学者着力研究的主题。比如，“青年抗议活动的政治形式和审美特征成为社会学的研究课题。”弗拉克斯教授的《青年与社会变迁》一书就是这类研究的成果。作为当年学生运动中坚人物之一，又作为当今的大学教授，作者把对60年代学生运动的研究既作为一种对自身经历和经验的充满感情色彩的回顾，又作为一种严谨的理论探讨。这就使这部著作有别于国际学术界的同类著作（如凯尼斯顿的《疏离者》、拉·福厄的《两代人的冲突：学生运动的性质与意义》等等），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

60年代学生运动本身依然是一个历史之谜。弗拉克斯教授依循青年与社会变迁这一思路来展开他的解谜工作。在他看来，学生运动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像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那种对既有文

化体系、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进行独立的、集体的和全面的反叛的学生运动则是近代才有的情景。这种否定一切的反叛若发生在那些经济落后且文化传统僵化的新兴国家，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美国也会发生这种反叛呢？就在这10年以前，这个社会似乎生机勃勃，人们普遍地被绚丽的“美国梦”所吸引，而那些学生们也刻苦攻读，彬彬有礼，努力向成人看齐，依循成人的期待来造就自己的人格形象，规划自己的未来。一切似乎是那么的富足，又是那么的令人憧憬。相形之下，60年代从校园到街头、从观念到行为方式诸方面所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的突然，那么的令人震惊。但一切都是那样的真实。

问题的答案只能从美国社会本身中去找。显然，即使在被认为以“稳定、富足”为特征的50年代，就已经发生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变迁。囿于历史的局限，当初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这种变迁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即使预见到了，也没有人料到显示这种后果的是青年学生，而显示的方式又如此激烈以致于整个社会都在担心：60年代初约·肯尼迪总统所说的传到“新一代美国人手中”的“火炬”会不会把这个社会烧个精光！

美国的青年研究从四五十年代起，就十分重视关于青年的社会异质性的具体分析。比如强调

对青年所归属的那个阶层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对青年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各种影响的探讨，以便于把握青年的现实活动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理论倾向同时也决定了在论述青年现实活动的时候，注重对丰富的经验材料的实证分析的特点。弗拉克斯这部著作也承继了这种传统，以此来具体分析50年代美国社会变迁导致6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并对各类青年的社会活动特点进行多层次的揭示。

青年所归属的社会阶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指的是他们的社会出身（即家庭），第二指的是他们本身的社会活动领域（比如学校、工厂、公司）。这两个方面都是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是最能反映出社会变迁的部分。弗拉克斯正是把握住这一点来展开他对60年代学生运动的分析的。

他花了极大的篇幅来分析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所经历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家庭结构上的简缩（核心化）、功能上的定向（消费倾向）固然是整个社会经济、科技高度发展的结果，但能体现社会的深刻变迁的表征却是这类家庭中双亲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作者指出，实际上在50年代，中产阶级的双亲们就陷入了一种严重的困惑之中。这是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在现实生

活浪潮的冲击下出现动荡的产物。弗拉克斯认为，美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即强调勤奋工作，自由竞争，积极储蓄，节俭克欲等美德。这一伦理曾经作为衡量美国人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尺度，曾经使美国在数十年时间里迅速强盛起来，它也是体现美国社会的高度整合的标志。而战后的经济、科技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企业管理的科层化使这一伦理原则受到严重的挑战。消费成了整个社会的主导动力，成了人们满足自己的各种冲动的全部的和唯一的方式。家庭逐渐成为独立的消费单位这一事实，使双亲们开始重新理解自己的职业目标、人生追求以及自己对家庭和家庭成员所承担的义务和权利。关键是，他们的这种理解是集传统伦理与现代精神于一体的。各种矛盾难以解决，困惑便出现了。他们的子女们——60年代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也被抛进困惑之中。在角色认同的形成、责任与义务感的培养、职业理想的树立、生活目标的建构诸方面，他们在自己的父母那里受到相互矛盾的教诲与启迪；而一旦他们步出家门踏上社会，却又发现这种教诲、启迪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重重。比如，关于权威意识的培养方面，中产阶级父母一般倾向于让孩子们自主自立，而后者发现这种自主自立在社会生

活中（在学校里，在公司里，在政府机构里）难以真正树立起来。双亲们向孩子们所灌输的成就意识，在人欲横流的现实中失去了意义。更严重的是，当孩子们面临这种困惑的时候，双亲却选择了“以传统的观念来劝诫和导引”的做法。这无疑在促使青年在对社会失望的同时，也开始对成人失望，他们便只能在同龄人群体中寻求理解和支持。难怪作者要发问：这样的家庭能否培养出“理想的”（即社会所需要的，又符合社会需要的）青年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追究家庭与社会这两者孰是孰非，而在于这种矛盾和冲突最真切不过地反映了社会变迁对青年的深刻影响，酿成了学生的独立的、集体的和全面的反叛的情绪基础。

与成人的对立、对社会的对立必然影响青年学生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形成。这若是一个孤立的过程的话，那也不致于形成广泛的抗议运动，弗拉克斯接着就着手分析青年所归属的社会阶层的第二个方面。校园的生活为青年学生的意识交流和反叛活动的酿成提供了多方面的现实条件：一是有自由活动时间去读书、去思考、去观察、去讨论；二是大学讲台上传播开来的新的价值标准和文化观念；三是相互之间的情绪汇流形成了对社会政策和社会现象的普遍的批判倾向。起初，青年们是怀着重重疑虑进入社会教育体系

之中的。对知识的追求与对解惑的渴望紧紧地缠在一起，学校若能满足他们的这种期待的话，那历史就要重写了。然而，学校同样经历着社会变迁浪潮的冲击，传统的教育目标失去了现实价值，教育方法的僵化生硬、教育结构的官僚化，等等，都使青年学生感到严重不安，再加上一系列社会政策（种族歧视，征兵、就业等）的实施，使青年学生产生了自身的危机感。他们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社会，即从疑问发展到不安感，从不安感到危机感，仿佛一步步接近深渊，于是，“50年代‘沉默的一代’为6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所取代。”

作者对青年学生社会阶层的分析，使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对美国社会的反叛首先反映在学生运动方面（而不是出现在其他阶层青年运动中），而学生运动中的主体则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

如果说，学生运动主要反映了中产阶级青年与社会的严重冲突的话，那么，作为一种反文化的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则是各阶层青年与社会严重冲突的产物。一般地说，学生运动被看成是青年亚文化的主要反叛形式之一，它主要是青年学生之所为，带有明显的激进倾向；而那些非学生青年则多用“越轨”或“放荡不羁”来表现他们对现实社会（从观念到行为方式、从规范到价值体

系)的深刻不满。在弗拉克斯看来,这不仅仅是反叛形式上的差异,而且是不同社会阶层青年对社会变迁所作出的不同反应,这种反应则是青年对自身的社会地位、自身的使命与责任、自身的社会理想与生活目标的不同理解的结果。作者由学生运动进而探讨青年文化,实际上把对青年与社会的状态的研究转向了对青年本身的不同状态的研究,其视角依然是社会阶层分析。

应该说,60年代初,由于青年学生最先感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最先被激起“疑问”、“不安”和“危机感”,所以,与社会相对立的青年亚文化的主要观念最先反映在他们的思想倾向和行为方式中,以后便逐渐在各阶层青年中散播开来。那些观念理所当然地不能被成人社会所接纳,令人深思的是,它最初也遭到了其他阶层青年的拒斥。这可以从不同社会背景的青年对社会变迁具有不同的感受这一事实中找到说明。尽管由于青年具有较为一致的心理危机感受,尽管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青年文化的整体性似乎越来越强,诸如特定的服饰、发型为各阶层青年所普遍采用;流行音乐的狂放节奏吸引着不同肤色、不同职业的青年;50年代属贫民区和黑人居住区中的下层青年之所为的吸毒现象,也在大学生中迅速蔓延开来……这或许都蕴含着“与成人价



值观念相对立的青年规范”带有反抗色彩。然而，这种共通性并不能具体说明社会变迁之于青年的各种影响的真正含义。当我们说60年代美国青年所面临的社会变迁使他们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我的价值、社会角色、伦理准则、职业目标以及一切有关自身成长的问题的时候，不能否认，不同阶层的青年的思考在内容、重点、方式诸方面是不尽一致的，因而他们的理想目标也是不同的。音乐、发式、毒品乃至流行语之类的“反叛”意义或“界定同辈”的意义，对各类青年来说，实实在在是一种象征。它们无法替代每一阶层青年面临的现实抉择。即使同是吸毒行为，青年学生和下层青年借此所要逃避出来的现实也是具有不同内容的，下层青年为生计奔波而遭到的种种困苦，使他们对社会现象的冷酷性了解得更加真切，而青年学生则更多地愤怒于社会现实的虚伪性。下层青年由于缺乏从自身境地中超脱出来的各种条件，所以，对自身的使命的认识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学生青年的使命感往往更明确，并对自己未来的前景抱有一定的信心。这样，两者在与社会的对抗形式方面也有重大的差异：下层青年的越轨行为倾向和暴力倾向显然甚于学生青年。显然，不同的反抗形式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由此，我

们能理解弗拉克斯斯提出的“学生运动的前景”问题。在学生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它必须与其他阶层青年的抗议活动汇合在一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学生运动所反对的社会秩序是如此的强大，以致于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求寻求同盟军。历史的悲剧在于，它与它的同盟军（黑人青年活动、下层青年抗议）在社会目标、思想观念以及政策策略的选择方面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在当时又没有一种力量能弥合这种差异。那么，学生运动乃至青年运动的前景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还需要从别的外在方面来寻找原因吗？美国青年在由60年代社会变迁所提供的历史舞台上的表演已经成为过去，但它却触发了人们不尽的思索。

青年自身的社会阶层属性的规定性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既定力量，它时时在提醒人们：不能对青年整体的社会作用一概而论，不能轻视各类青年对社会变迁的反应（情绪、认识以及现实行为抉择）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或许这种差异正是我们全面认识青年和青年运动的起点。这就是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给予后人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从弗拉克斯斯教授的这本书里，所有的读者都能领悟到这一启示。

1988年3月

## 丛书导言

在由我们主编、麦克哈姆出版公司发行的，《美国的社会进程与变迁》这套丛书里，理查德·弗拉克斯的这本书对美国新一代大学青年怎样把50年代的死气沉沉的校园变成60年代的具有政治反应能力的场所，作了极其明了的论述。学生们把过去显然不见踪影的抗议和政党活动引进了校园（若不如此的话，言谈就会成为与死啃经典之类相差无几的玩艺，而不成其作为一种观念的竞争），又把对自身现实地位的不满转变成了超越校门的社会性行动和社会性实验，由此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我们看来，弗拉克斯教授关于学生运动的这种演变的鲜明观点是富有党派色彩的。虽然他的分析表现了对激进的青年运动的同情态度，但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相反，这种分析是以对这种运动在不断演变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和策略进行批判性重估为基础的。我们不必像弗拉克斯教授所做的那样过分关注运动本身，而要更多地了解在6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中青年

（尤其是中产阶级青年）所扮演的角色。

20世纪60年代大学里发展起来的激进的青年运动前途未卜。要记住，学校里的吵嚷之声经常（但不总是）是由少数学生喊出来的。然而，许多规避了行动主义的年轻成人依然默默地为投身到传统的职业里去作准备。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中学毕业以后就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建立起了家庭，他们没有在大学的舞台上露过脸。显而易见，许多青年在生命历程中已经确立起与上一代无异的模式，而且肯定会和老一代一样对基本的社会变迁持反对态度。另外，即便有那么一些青年极为偏激，但一旦离开学校以后，他们有时会转向老年人的保守和社会态度。虽然如此，断言说60年代的激进的青年运动是白忙一场，那还为时尚早。正如弗拉克斯教授在结论部分所指出的那样，激进的青年运动超越了其本身的各种可能而对美国社会的未来历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今天看来，60年代的大学行动已经为我们的社会开辟了许多途径。至少，一个年轻的专业人员在今天有选择终身为他人服务的途径的自由——这种选择在10年以前是不存在的。另外，两性之间的多样化关系也为社会所容忍；那种认为金钱会销蚀个人道德价值的想法已经急剧地消衰了。

激进的青年并不是到处受欢迎的，因为他们

不能从我们许多人中间发现美好的东西，也不能揭发出我们这些人中间的最丑恶的东西。可怕的是，一些热衷于知识自由、热衷于不同政见的著名学者却把青年的质问和抗议说成是法西斯主义，说成是精神病。没有人喜欢提出一些连他自己都不能解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名人，也可能产生防卫性反应，退回到极权观点上去。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新的心理学原理。同样地，也没有人喜欢提那些别人会避而不答或言不由衷地作答的问题。发出质疑的青年会使那些因为诉诸威胁不诉诸理性而失去权威地位的权威们感到难堪。要理解这一点，也不需要什么新的心理学原理。确实，学校里的激进高调往往空洞无物，而不显得锋芒毕露。这或许应归咎于高等教育的失败，而不是空喊高调的学生们的过失。要以侵犯他人在现有体制中的工作和学习的权利为借口清除大学中的混乱状况，这易如反掌。无疑，这种主张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通过对另一些人的自由的调适也可以保障一些人的权利。

虽然我们并没有像弗拉克斯教授那样热衷于激进的青年运动并施以同情态度，但我们确实感到，这种运动已经提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问题，而且，大学里的麻烦最终肯定要到高等教育

销组织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些方面来究根问底，而不会归因于少数反叛青年的空想和堕落。以人们的邪恶来解释这种运动，只不过是压制这种运动提供道德方面的口实罢了；而用现存制度运行的腐败来作解释，才算是许下了关于美好社会的诺言。和他们的长辈们比起来，激进的学生们常常更明了这个道理，而那些长辈们总是不太愿意面对下述事实：大学以及其他制度若不属于这个社会就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存在。

在编辑这套丛书时，我们曾鼓励作者们利用所有适宜的、系统的和定量的资料。我们还建议他们运用其他资料以补定量资料的不足。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向作者们提议，使用激励性的笔法来铺陈他们的资料，并用一种理论观点、一种主题或一种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原则的批判性见解来将他们的统计资料和文献资料串联起来。弗拉克斯对那些已经影响了大多数人并且会影响我们的未来生活的事件所做的动态性评估与批判，确实符合上述要求。

罗伯特W·霍奇（密歇根大学）

戴维P·斯特里特（纽约州立大学）

## 导 言

谈论“青年”的书刊和文章真可谓连篇累牍。只要编辑们、知识分子们、社会科学家们和其他人认定有必要对青年们的行为进行描述、分析、辩护或攻讦，一般人也就会有拜读这类文章的需要。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对青年们的行为寻根究底，是因为青年们正在以各种方式攻击并且背离美国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主要制度及其原则；而这些活动偏偏发生在物质丰裕、个人有充分发展机会的时代里。许多美国人耳闻目睹了这种反叛——特别是发生在其他地方、其他年代里的反叛——但他们往往只把它们解释为一种对饥饿、苛政以及不平等的反应。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反叛行为竟然发生在衣食不愁、有着良好经济前景、生活优裕、享受着过多的自由的美国青年——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青年——身上。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是无法理解的。它肯定蕴含着新的变故：一种来历不明的运动正威胁着既存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它是这样地

无法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对它进行解释。

也许你不再想拜读议论青年的书刊了，也许你和我都认为，有关青年的大多数报道和解释是极不准确、极不完整的；也许我们一致确信，目前青年群体中所发生的问题已经够明显、够深刻、够复杂的了，它们使我们不得不经常澄清、修改并发展我们的认识。

我不敢担保说，我在这本书里所能够提出的概念和理论会比你曾经读到过的、思考过的或讨论过的概念和理论更加完美无缺。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对本书准备探讨的事物评述一番并对我提出的独特观点进行阐释。

就50年代的大学生而言，我当时可算作是一名“离轨”分子了，因为我是积极的政治参与者。作为一个大学校园里的青年民主党主席，我曾经参加过支持民权法案的请愿游行，出席过许多会议，散发过不少传单。在我们学校的上万名学生中，政治上极为活跃的，约有50人，其中包括了所有的青年民主党党员、青年共和党党员、青年社会主义党党员、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学生会员，以及学生中的政治活动参与者。每当我们动员学生们为民权请愿活动签名时，通常的反应是，谁签了名或参加了某种团体，在将来谋职时，谁就会因此而遇到障碍。总而言之，那是一



个对政治普遍持冷漠态度的时代。整个50年代充斥着这种政治冷漠感，因为人们唯恐坦露自己的见解会招致各种麻烦。这种态度根植于对麦卡锡主义的恐惧（在经济萧条的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被认为是极端分子和改革者的人被列上黑名单，并对他们进行肆无忌惮的缉查）。

我记得，在50年代，学生们不仅表现出对政治的普遍的冷漠，更有甚者，崇尚“温文尔雅”的风气像浓雾一样，几乎笼罩了他们的整个生活。所谓“温文尔雅”就是处处表现得“像个学生”——短头发、东部名牌大学的深灰色上衣、齐膝短裤，还有圆别针。而在政治冷漠和温文尔雅的背后，则弥漫着一股人人都想“如此这般”的气氛，即都想躲入一个安稳的、清静无争的、友好相处的村镇似的世外桃源之中。

但是，在我们中间有一小部分人却属于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在对各种事物的兴趣方面，我们并不随波逐流。我们关心社会、关心艺术、关心书本、关心思想，但我们却和一般人不同，我们怀有强烈的愤世嫉俗心理。在我们看来，未来的时日 and 50年代相差无异。在那时，我们所能期望的，仅仅是一种心灵较为充实、较富有乐趣、较有原则性的生活方式而已。在我和我的大多数朋友看来，学术生涯能够使我，